

## 划船滨,我梦中的故乡

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出生在那条大河边。它被称为划船滨,和黄墟村平行,由东向西,全长不到三四公里,东和溧戴河相接。当时,溧戴河是我市南北水运最繁忙的河道。宜兴的张渚太华以西,郎溪以东、广德以北的几乎整个山区的山货,都要通过溧戴河运往长三角,甚至全国各地。不分昼夜,河面上桅帆如织。

相对溧戴河的繁忙,划船滨却又是一番勃勃生机。

划船滨和溧戴河相交处,枯水季节,两边都是露在水面上的河滩,只有一条10米左右宽的河沟。向西不到100米,河面渐宽,村中心对着河面最宽的地方。在那又正好有一条通向村庄的支河,河面更显浩瀚宽阔,差不多有近200米。

据说很早以前,河面上没有桥,南北往来很不方便,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两个童男童女,义务为来往的人摆渡。后来村里有个大善人出资,在村西端河面相对狭窄的地方建了座石桥。石桥建好后,童男童女就不见了。村里人因怀念童男童女,便命名为划船滨。

我敢负责任地说,划船滨是世界上最美的河。两岸土地肥沃,四季野花及农民按时种植的作物四季变换,河堤上高高的杨柳迎风招展,划船滨美得让人惊叹。

大自然的包容、和谐、宁静、大度,都能在划船滨母亲般胸膛的河面得到验证。四时不改的碧波,欣赏着童话般的满天萤火虫的飞舞。星河倒垂在水里,星光、月光,和岸堤上杨柳绰约的影子以及远近村庄的犬吠声,不远处的那座石桥,隐隐约约。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善人早已仙去,而石桥在村里人的守护下,却依然完好。我相信,来去的行人中一定会有人怀念这位大善人的。如果多些善良的人,让世上的坎坷都变成坦途,那该多好。

特别是早春,鱼儿繁衍的季节,每天清晨,在刚长出新叶的芦苇丛中,成群结队的游鱼相互追

逐,时而有鱼儿“扑嗤”一声跃出水面,在空中翻个筋斗,又“扑嗤”一下潜入水中,突然把清晨河面上的平静刺了一个口子。傍晚时分,如期而至的渔人,以及古老有节奏的赶鱼的梆子声从河面上传来,在村庄田野上空回荡。低沉,悠长,有着历史的苍凉,常常在我童年的心灵中过早地激起淡淡的忧伤。

对我们孩子而言,最难忘怀的还是夏天。划船滨是天然的游泳池。河面宽阔,河水不是很深,河床两边是河滩,一般时候,水深只能淹到我们的胸部。中间河槽深些,也不及两米。河滩上的泥是粉质粘土,不黏脚,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像踩在海绵上。

水乡的孩子和水特亲,很小就会游泳。一到夏天,我们就像水葫芦一样,整天泡在水里面。追逐,打水仗,捉迷藏。玩累了,就仰在水面上,看着白云在蓝天上悠然飘动,聆听水浪“咚咚咚咚”的声音。许多小鱼围在我们身边游来游去,咬我们的皮肤,酥酥的,痒痒的。这一刻,我们的灵魂仿佛离开了躯壳,和白云一起飘去,和水波一起浮动,和鱼儿一起游动。

大人们也没闲着,用绳索系着木盆,在河滩边捕捞河蚌。划船滨的河蚌都是生产珍珠的那种。据说是摆渡的童男童女的汗珠生成的,很鲜嫩。

秋天的傍晚,划船滨特别静谧。偷偷把生产队的小木船荡进河心,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坐在船边,享受水面上带有腥味的微凉的凉风,欣赏着童话般的满天萤火虫的飞舞。星河倒垂在水里,星光、月光,和岸堤上杨柳绰约的影子以及远近村庄的犬吠声,不远处的那座石桥,隐隐约约。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善人早已仙去,而石桥在村里人的守护下,却依然完好。我相信,来去的行人中一定会有人怀念这位大善人的。如果多些善良的人,让世上的坎坷都变成坦途,那该多好。

## 在华盛顿巧遇常州老乡

——记美国造船专家卞保琦

1997年8月,我被外交部第二次借调派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领事部负责侨务和领事保护工作。在近4年的任职期间,我在华盛顿有过许多巧遇,每次巧遇都使我惊喜、兴奋和激动。其中巧遇美国造船专家卞保琦老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98年夏,中国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南方地区灾害特别严重。灾情牵动着海外华侨华人的心,美国华府地区侨界朋友们自发组织捐款活动,各社团希望把捐款通过大使馆转交国内有关部门赈灾。大使馆总领事李淑芳指定我负责接收侨胞的捐款。消息发布后,有多个华人社团踊跃前来捐款,也有知名华侨华人个人单独捐赠救灾款。我手捧着沉甸甸的捐款,深切地感受到海外侨胞们爱国爱乡的情谊。

一天上午,我们刚上班,使馆门卫打电话通知我,有一位老侨胞来捐款,我当即下楼。在使馆门口大厅里,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材魁伟、腰板硬朗的耄耋老人。我把老人领到一个宽敞的会客室,还没等我倒好茶,他就对我说:“我叫卞保琦,今年83岁。从电视上看到中国大陆遭遇特大洪水灾害,华东地区特别严重,我家乡在江苏武进。今天我到这里略表心意,尽我一点绵薄之力。”说着就拿出一个开口信封,内有2000美元,双手递给我。这不是我地道的老乡吗?我激动地站起来握住他的双手,对他说:“我也是从常州来的!”我当即决定把他列入华侨华人贵宾名单里,并邀请他和夫人出席大使馆为华侨华人举办的国庆节和春节招待会。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他说,国庆节招待会他可以参加,春节招待会可能不能出席,因为他们在美国最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外



卞保琦老人在母校南夏墅中心小学与小朋友。

的海岛上建造了一个别墅,每逢冬季来临,他们都要自驾前往那里过冬,华盛顿的冬天太冷。

卞保琦老人1916年出生在常州武进,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43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船专业,1948年获该院造船和轮机两个硕士学位,1951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进入美国海军船舶研究中心工作,在国际造船界享有盛誉。他是研究制造全球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的7位美国专家之一。

1977年,卞保琦第一次回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并设宴招待。从此,他坚定了回国献力、报效祖国的决心。1981年,卞保琦回国后,首先在武汉船舶设计院对我国的“东方红”号客轮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正和改进,“东方红”系列船舶大大降低了能耗。他还多次应邀回国到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讲学,他的“应用兴波阻力理论设计船身线型”理论被上海交通大学收入教材,是学生的必修课。

1998年10月,卞保琦应邀出席大使馆为华侨华人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居住在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海军军官高级住宅大楼内,我和夫人应邀去他家做客。他的夫人是一位出生在杭州的退休医生,颇有大家闺秀的

气质,待人和善热情。他的书桌上全是设计工具和图纸,壁橱里展示的都是各种舰船模型。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根在中国,我不能忘本。”他情真意切地告诉我:“我要让下一代记住,我的根在中国,中美两国人民应永远友好下去。”他还把儿子和“洋媳妇”介绍给我们,要我们双方保持联系。

他用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诺言和心愿。2004年初,他不顾89岁高龄,从美国回到了故乡南夏墅镇,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通过自己的基金会,对南夏墅中心小学的教学设施、图书馆和生活设备给予了资助。

## 扎笤帚

笤帚,这一如今已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物件,却承载着一段独特的生活记忆。

时光回溯到四五十年前,那时在我老家郑陆前庄头,笤帚可是全村的“明星”。它不仅是村民重要的经济支柱,更是大家发家致富的希望之光。上世纪40年代,一位从江阴迁徙到我村的新村民,将扎笤帚的手艺带到了前庄头。从此,这个小村庄便与笤帚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扎笤帚的手艺如星星之火,迅速在整个村庄蔓延开来,村民们都热情满满地投入到这项手艺中。而到了改革开放后,扎笤帚已然成为前庄头的核心产业,笤帚的销路如繁花绽放,遍布各地。整个常州各行各业,只要有笤帚的身影,几乎都来自郑陆前庄头,甚至有些笤帚还远销新疆等地。那是笤帚的“黄金时代”,也是村庄的骄傲岁月。

扎笤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原材料的采购,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笤帚的材料主要包括苗(高粱穗或粟穗)、竹壳(毛笋皮)、蛇皮丝和稻草。苗的货源要从河南、山东、安徽一带批发,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村中的采购者们常常要历经长途跋涉,乘坐火车、汽车或船,将苗运回到村上。父亲也曾参与过采购苗的工作,那是一段让他刻骨铭心的经历。他要背着沉重的行囊,在拥挤的车厢里忍受着颠簸和疲惫,有时甚至连续几天几夜不能好好休息。途中的困难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劳累,还有对家人的牵挂和思念。而其他材料准备就比较简单,像竹壳直接从宜兴运来,而蛇皮丝和稻草可以自己准备。同时,扎笤帚还需要一些工具,如腰带、尖脚板、铅揽和木弯头。

当所有材料和工具都准备好后,就可以开始扎笤帚了。首先要将稻草做成草心,50个草心为一捆。每当母亲做这一步时,总是格外认真,她那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摆弄着稻草,仿佛在赋予它们新的生命。接着,把苗捆成一个笤帚头,然后用笤帚头包住草心,外面再用

竹壳裹住,把蛇皮丝在竹壳上一档一档扎住,每档间距3到4厘米,每把扎12档左右,最多不超过15档。傍晚时分,父亲下班回到家,顾不上一天的疲惫,立刻加入到扎笤帚的工作中。年幼的我也在一旁帮忙,虽然我的小手还很稚嫩,但我努力地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诸如递工具、整理散落在地上的稻草和把苗重新集合起来。就这样,一把把笤帚的雏形在一家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渐显现。

接下来是修剪笤帚头,这一般都是父亲的工作。父亲先用蛇皮丝把笤帚头编好,再用剪刀把笤帚头的苗剪齐,让它看起来美观大方且更加实用。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专注和认真,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最后,再用刀把笤帚尾处的竹壳切掉。经过父亲的精心打造,一把精致的草柄笤帚就完工了。

除了普通型的草柄笤帚,还有精致型的竹柄笤帚。它的做法和草柄笤帚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在草心中插一根竹柄,并将其固定住。这样的笤帚使用起来更加舒适,人也不会太累。此外,还分黑苗笤帚和红苗笤帚。黑苗比较柔软,所以黑苗笤帚使用寿命较长;而红苗比较坚硬,因此红苗笤帚使用寿命较短。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十几年前,笤帚如同一位年迈的行者,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曾经,它是许多家庭赖以生存的依托,是生活的希望。然而,时代的变迁如汹涌的浪潮,不可阻挡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轨迹。从此,无数靠扎笤帚为生的家庭开始了新的谋生之路。父母亲在岁月的侵蚀下逐渐年迈,曾经那双灵巧地扎着笤帚的手,如今已略显迟缓,他们终于摆脱了扎笤帚的生计,开始享受悠闲的晚年生活。

如今,再回忆起那段扎笤帚的岁月,我深深地感觉到那是父母亲辛勤劳作的见证,是家庭团结一心的象征,更是那段艰苦岁月里的温暖港湾。尽管笤帚已逐渐淡出了生活,但它所承载的情感与记忆,却永远不会消逝,成为了他们这辈子难以磨灭的珍贵回忆,也激励着我们珍惜当下,勇敢面对生活的每一次变迁。

## 市工人理论组学习活动琐忆

我市知名作家邹国平先生的纪实散文中,写到过上世纪70年代常州市工人文化宫曾经有个诗歌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文学青年。其实,当时市工人还有一个工人理论组,培养了一批工人理论骨干,后来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成了中坚力量或担任领导职务。

常州市工人理论组是市总工会与市革委会宣传组商定后于1976年夏秋之交成立的,成员主要来自全市基层企事业单位的一线职工,适量吸收工人干部、政治教师参加,首批成员34人,经过三次补充调整,先后共有成员61人。我作为常州煤炭系统的一名矿工,参加了这个工人理论组的学习和活动。

市工人理论组按照党中央培养一支工人阶级理论队伍的要求,每周五开展一天脱产学习或活动。学习活动的地点起先在东门小九华西江苏工人常州疗养院(当时称工人政治学校),后来就固定在市工人文化宫。学习讨论采取集中讲课辅导、分组讨论交流、个人撰写心得、集体编写材料等形式进行。学习内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读本,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选”及30余篇围绕形势中心的重要文章等。该组两年间集体编写宣讲辅导材料74篇,其中23篇印发给基层;撰写揭批“四人帮”的大批判稿182篇;前后有21人次参加全市宣讲和揭批活动。

1976年9月9日,市工人理论组在工人政治学校开展学习活动。下午3点多钟突然接到紧急通知: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大家务必组织收听。理论组便改变原先计划,怀着严肃紧张、忐忑不安的心情和疑惑猜测的心理,集中



1976年12月,常州市工人理论组部分学员合影,三排左为作者。



常州市工人理论组学习材料。

在一个房间,肃静地等待那个从未遇到过的时刻的到来。4点整,喇叭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男播音员低缓哀伤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大家悲痛欲绝、泪流满面,以后的学习活动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到悼念活动

上来了。市工人理论组在学习政治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还下基层和跨地区进行调研参观。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市工人理论组一行11人乘长途汽车赴南通进行为期5天的学习考察、交流取经。汽车途经如皋时遭遇

雷暴狂风大雨,不得不暂停行驶近一个小时,加上当年道路狭窄,路况和车况差,到达南通市总工会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汽车足足开了5个小时。南通市抓职工队伍思想理论建设很有特色,一些做法值得常州学习和借鉴。我们在南通市工人文化宫会议室与南通的工会干部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还参观了通棉一厂、通棉二厂、友谊服装厂、天生港发电厂等企业,并进行了互动交流。

1977年3月,市工人理论组编写了宣讲材料《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分几路深入基层进行宣讲辅导。我也承担了编写和宣讲任务。3月25日下午,刚20出头的我,带上万余字的讲稿,来到西庙沟的一个会场,给城建局的干部职工代表作雷锋先进事迹专场报告。面对台下黑压压的陌生人群,我有点紧张,但没有怯场,比较生动地将讲稿的内容口语化地传递给了听众,在大家的掌声鼓励下,结束了半个小时的宣讲。我为自己能宣扬雷锋精神发挥一点作用感到欣慰。

1978年,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影响深远。1979年9月,正值庆祝国庆30周年,省总工会联合省委宣传部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省委招待所组织了为期20天的真理标准学习讨论会,来自全省各行各业和有关高等院校的代表100余人参加学习讨论。常州与会的4位代表均是市工人理论组成员,我们通过集中学习、专题报告、分组讨论、大会交流及参观游览,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坚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在学习讨论会上,我首次看到了彩电,观赏了十多部国内尚未公开或刚解禁的国内外电影和戏剧,与南京大学教授近距离对话交流。老师们儒雅的风度、谦逊的态度和渊博的知识令我敬佩与难忘。